

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

金灿荣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提出了综合安全观,标志着中国的安全观发生很大改变,即由原来比较传统的、以国防为中心的安全观转为一种“大安全观”,主要体现在内外部并重,略偏内部;传统和非传统并重,由传统偏向非传统;强调内外互动。

我们在接受新安全观的同时不能将其内容泛化,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与安全挂钩。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时,还是要扣住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在此基础上,增加非传统安全、内部安全等内容。否则,可能不利于理解事实,甚至离事实太远。

国防安全还是基础,硬力量还是基础。如果美国人打伊拉克成功了,现在谁还谈美国衰弱呢?就是因为没有成功,所以现在才出现“后美国时代”、“无极时代”等议论。因此,我们虽然要根据时势的变化扩展我们安全观的核心内容,但其内容不要泛化,外延不要无限扩大。

在分析中国的安全态势之前,需要对中国进行准确的国际定位。

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有很多说法,我强调这样两个定位:一个是充满希望的新兴大国。毫无疑问,现在大家提起新兴市场国家时会提到很多国家的名字,如“金砖四国”、“展望五国”、“新钻 11 国”等等,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最厉害的是中国。2008 年 3 月,我应邀访问印度,当我表扬印度崛起时,印度的战略研究人员却都表示,印度和中国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中国是超级大国,中国抬高印度完全是为了忽悠美国。当然还是有印度记者说,印度必须努力,否则 20 年后上海就赶上孟买了。但是真正的高手都很清楚,中国是新兴大国,而且是新兴大国当中真正有实力的。经济危机加速了中国的崛起,这个判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2009 年 3 月,我参加布鲁塞尔论坛,有机会见到罗伯特·佐利克,我问他对金融危机的政治影响的看法,他的

*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回答是这个太清楚了,你们中国是大赢家,将第一个走出危机,美国将是第二个。当时他估计中国将在2009年底走出危机,美国则在2010年年中摆脱危机。所以,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就是真正有实力的新兴大国,危机也加速了这个进程。

另外一个定位是中国是一个内部面临诸多挑战的脆弱大国,中国内部所面临的挑战要多于一般的大国。我认为至少有三大挑战:首先是政治稳定,这是很多大国没有的。尽管现在有一些正面的肯定,例如,张五常教授说中国现在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但是绝大部分中国政治精英都对此表示担忧;其次是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过去的发展方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最后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问题。台湾问题没解决,这将永远是我们的软肋。

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使三个困境更加突出,外交决策的背景更加复杂:

第一,身份困境(Identity Dilemma)。一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官方定位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在具体的人权议题、气候议题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也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利益、贸易利益、安全利益,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趋同的。我们也不喜欢国际上的“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s),内心真的不喜欢,不喜欢程度不亚于美国人。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将越来越面临“身份”这个问题,这对中国的政策是一个挑战。

第二,认知差距(Perception Gap)。现在,外国的战略家很看重中国,而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层,却很看不起中国自己。而且双方都非常地真诚,一点都不假,这是一个悲剧。

第三,新型的内外互动格局(New Pattern of Interaction)。其实内外互动是一个永久的现象,任何大国的决策都面临内外矛盾交织的现象,但是它的形式在发生变化。在中外关系中最新的变化是:一方面,外部媒体现在的焦点转移到中国来了,西方大媒体在远东的总部大多已经从日本东京转到北京了,外国对中国的关注度上升;另一方面,中国现在有3.4亿网民,超过了美国的总人口,网民对外交的关注度上升,所以互动比以前变得更复杂了。现在外国人批评中国人的技术水平和含金量要提高了,不能随便造谣了,因为有很多网民懂英文,他们会揭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是怎么造假的。同时,中国网民也非常不可预测,今天可以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明天就可以骂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

正是基于上述复杂的决策背景,所以,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挑战也有相应的优先顺序,即:(1)政权稳定第一。关于这一点,国务委员戴秉国在2009年7月27、28日召开的中美对话上明确指出,中国的利益第一是制度,第二是国家主权,第三是发展;(2)维护国家统一。主要是反对台独、藏独、疆独等等;(3)整体经济安全。比如说,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对外依赖度;(4)美国对中国的内在接受度。中国现在的大战略事实上已经确定了:就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崛起。这个战略在2005年、2006年已经确定。现在,美国人试图在接纳中国,但是这个接纳过程是不

顺利的,特别是一些美国的小跟班不一定接纳,比如说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欧洲;(5)处理好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周边国家都希望在中国崛起之前为领土争端问题找到对它们有利的解决办法。我们愿意“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他们不愿意等。我觉得现在的现行“拖”的办法是对的,但问题是周边不让你拖,人家希望在你强大之前拿出一个解决办法;(6)资源的挑战。

为了应对上述六大问题,从外交政策层面(国家能力是另外一个问题)上讲,我们需要做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强调自主性。近代以来,中国存在身份认同(identity)缺失的问题,这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曾一度辉煌,但在近代向工业文明适应过程中却异常痛苦。西方创造了工业文明并且向全球推广,每一个非西方社会适应这个过程都是非常痛苦的,中国尤甚。中国知识界曾错误地进行推理:由于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对这一重要问题没有处理好,推导出中国人不行这个整体性的结论,进而要求改造国民性。由此导致了中国国民身份认同的丧失。在向苏联学习的时候,中国走到了极致;向美国学习的时候,学得比美国还绝对。美国经济学家都不敢用自己的模型来套美国的现实,中国竟然拿来美国的模型就直接制定政策。中国为什么老走极端呢?就是因为没有自信心。现在,无论是中国自身下一步的发展,还是国际社会未来的平衡发展,都需要中国人把自己的自信心、身份找回来。

第二,中国能否在现有体制内和平崛起,关键还是要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能否最终接纳中国。至于这个工作该怎么做,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做得还可以,但需要在内外进行一些微调。

第三,必须意识到,即使中国决心在体制内和平崛起,并且使西方在心理上接纳中国,然而在资源需求上,中国和西方仍然存在矛盾。中国崛起的结果是,中国出价越来越高,将把美国的资源占有比例从现在的一个人占世界平均水平的八倍变成四倍,这对美国是伤筋动骨的。如果程度再大一些,由八倍变成两倍,这个国家就没法管理了。所以在资源调配问题上怎么找出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路是技术创新,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一起联手搞技术创新,用物理手段解决资源问题。

第四,另一个解决资源问题的思路是中国可以多承担一点责任。中国真的要树立责任感。

总之,未来的政策应该朝着四个方向进行调整:首先,加强自主性,这是对所有知识分子一个共同的要求,当然也是中国制定正确的未来国家安全战略的前提;其次,要进一步优化和改进中国的政策,让世界真正接受中国;再次,应认识到,在现有体制内崛起,还是要遇到资源问题的,因此中国人要自己想办法进行科学和技术创新,用物理方法解决物理性的问题;最后,中国要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通过分担国际社会的制度成本,获得自己的权益。